

论陈独秀的科学观

杜 扬

(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 北京 100871)

摘 要: 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和民主思想始终交织在一起,这是他不同于前人之处,也是他比同时代人深刻和独到之处。他不是纯粹的科学家,却和所有真正的科学家一样首先是个唯物主义者。他更看重科学的社会功能价值,并用“方法”为科学做出了统一的脚注。在对西方科学狂热的尊崇中,他倡导的是实证、是主客观的统一。接受马克思主义之后,朴素的唯物论的科学观升华为唯物史观,“物质一元论”在成为“科学一元论”之后又被赋予了“经济一元论”的色彩。

关键词: 科学观;唯物论;唯物史观

中图分类号: N0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5680(2004)04-0082-04

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影响深远的人物,也是一位相当复杂的人物。他出生于一个世代习儒却功名未显的“小户”人家,从小习四书五经,却对此深恶痛绝;他是光绪二十二年的秀才,却在乡试后与科举分道扬镳。他不是科学家,甚至对科学的概念“决不超过对牛顿物理学的模糊理解和对进化论的肤浅研究”。^[1]然而却偏偏是他首先在中国举起了科学的大旗。科学在近现代中国的启蒙和传播离不开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则离不开陈独秀。那么这样一个没有受过系统的现代科学训练的人,何以如此推崇来自西方的科学?他所理解的科学是一种怎样意义上的“科学”?这种意义上的“科学”启蒙对于当时的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对于今天的中国又有什么意义?本文试图将目光集中在新文化运动时期来探讨这个问题。

五四,几乎是一个可以认定任何新价值的时代,但在20世纪陆续引进的诸多西方思潮中,唯有“科学”获得了众口一词的推崇,迅速成为封建制度坍塌之后人们心中新的权威。要说介绍西方的科学、哲学、政治思想等,严复的贡献无人可比,但科学在中国的传播却不是始于严复。严复说西方文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行政则屈私以为公”。^[2]这一“公”一“真”似乎为二十年后陈独秀请来的“德先生”和“赛先生”埋下了一个伏笔,郭颖颐说“严复奠定了新时代思想家们把现代科学作为一种价值体系而接受的基础”。^[3]而陈独秀,也确实“把科学作为现代价值观的看法始终未变”。^[4]

新文化运动前期从事改良的知识分子,看到了西方科学

技术的威力,是怀着对科学万分欣赏的态度接受科学的,“他们对科学所做出的价值上的判断显然已经融合了他们的社会理想”。^[5]陈独秀无疑是这“新时代”中一位十分杰出的思想家,他的科学概念源于“哲学的唯物主义”,并且在思想上从未“偏离唯物论的决定观”。^[6]但他又缺乏对这种哲学观念理论上的逻辑思索,热衷的是一般意义上对科学的尊崇,并殷切希望广大民众也能接受这种尊崇。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陈独秀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其科学思想中的唯物倾向也逐渐登峰造极,发展成“科学与唯物史观具有同一涵义”。^[7]有学者认为,此时陈独秀所指的科学也强化成了“科学主义”,尤其是当“共产主义教义的哲学涵义事实上更符合他早期的科学决定论信仰”时。^[8]

一 科学与民主并重

早在《新青年》前十年,陈独秀第二次从日本回国时,就开始创办自己的第一份刊物:《安徽俗话报》。他的动机和出发点首先是反帝爱国,其次是反封建专制及其恶俗。从反帝反封建的角度来说,陈独秀其实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开始宣扬民主和科学了。《安徽俗话报》的内容包括有“本省的新闻、历史、地理、教育、实业、小说、诗词、闲话、行情、要件和来文等十三门,从第八期又增加了兵事、卫生、格致三门”。^[9]目的就是希望通过文艺作品和科学知识,唤醒人们国破家亡的危机感和对封建旧俗的抵制。陈独秀十分悲愤国人“只知有家,不知有国”的短浅,反复宣扬“全树将枯,岂可一枝独活?全

【收稿日期】 2003-09-14

【作者简介】 杜 扬(1979-),女,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硕士生。

巢将覆,焉能一卵独完?^[10]的道理,他认为首先要启发民众的爱国心,扫除他们的愚昧、自私和狭隘,这样才能捍卫国家主权。而这自然又要求提倡民权,反对君权,人人自由民主,毕竟这是“一国人所公有的国,并不是皇帝一人所私有的国。”在文化教育上,陈独秀又提倡“要多多的新排有益风化的戏”,“不唱神仙鬼怪的戏。”^[11]民主和科学,在陈独秀看来,似乎就是可以让人变得爱国和远离迷信的良方。蔡元培在二十八年以后回忆《安徽俗话报》时说,那个时候的陈独秀实际上就已经开始做“表面普及常识,暗中鼓吹革命的工作”了。^[12]

《安徽俗话报》停刊之后,陈独秀有过一段时间的政治沉浮,但都不得意。他终于明白:要“革命”,首先要革“中国人思想的命”!“欲使共和名符其实,必须改变人的思想,要改变思想,须办杂志!”^[13]中国人在意识上需要革命、行动上也需要革命,这或许就是陈独秀心中民主和科学的雏形。这个时候,《新青年》就已经呼之欲出了。

《新青年》里的民主和科学“不仅代表了社会的理想,而且也是拯救中国的武器和值得为此献身的信仰”^[14]。其实,在陈独秀之前就已经有很多进步人士开始了对科学的求索,但终究没能像新文化运动这样使得“科学”在中国成为人人关注的对象。就像胡适说的那样:“近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地对他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15]洋务派只看到了船尖炮利却反对民主政治;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结果也只是赶跑了一个形式上的皇帝。陈独秀很不同于他的诸多前辈和同辈人的一点就是他始终把民主和科学放在并重的地位。他深知“不倡导科学,理性得不到张扬,民主难以普及;民主不普及,科学也无法发展。”^[16]虽然在这两面旗帜的提法中,“民主”是放在“科学”前面的,但“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17]民主和科学是新文化运动自始至终的两样有力武器。这一点,是陈独秀比同时代和前时代其他知识分子深刻和独到之处。

但陈独秀与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共同的立场,即他们都是从价值系统的层面来接受近代科学,希望能借科学实现他们的社会理想。在陈独秀看来,科学本身就代表了一种先进和现代的文化。“近世文明,东西洋绝别为二。代表东洋文明者,曰印度,曰中国。此二种文明虽不无相异之点,而大体相同,其质量举未能脱古代文明之窠臼,名为‘近世’,其实犹古之遗也。可称曰‘近世文明’者,乃欧罗巴人之所独有,即西洋文明也。”^[18]他认为中国人不知西方科学,沉迷于封建仁义道德和儒学纲常,还停留在“古代”,只有掌握了自然科学知识的“欧罗巴”才称得上是“近代”。在陈独秀看来,科学是“近代化”的标志。言下之义便是指中国要改变目前落后的社会状况,要走出专制和愚昧,就少不得赛先生,“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他也因此“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19]值得注意的是,他一开始涉及到科学就是

把科学当作一种实现其政治理想的工具,而不是要致力于具体科学知识的研究。这使得他对于科学理解,显示出很强的目的性,缺乏冷静和理性的思考,在追求实效的过程中不免急迫和焦躁。

二 从唯物论出发

陈独秀对科学较为系统的思考和论述始于《新青年》,在《新青年》首卷他撰写的第二篇文章中,陈独秀热烈称颂法兰西文明:人权说、生物进化论、社会主义,“此近世三大文明,皆法兰西之赐”^[20]!他深感东西方文明的差异,对科学的提倡和宣扬也多以西方为参照。他反对我国古代阴阳对立的认识论、伦理化的有机自然观。认为“以人伦解释自然,是中国尚未走出蒙昧时代的标志”^[21]换句话说,中国的这种自然观太过于主观唯心,一切从人事出发,即便是涉及到一些科学现象,也是为人作比,这与他所理解的西方“唯物论”的科学观完全是背道而驰。“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之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即,科学就是主客观的统一。与“超脱客观之想象”、“抛弃主观之理性”、“凭空构造”的想象完全对立,时人就是因为只“有想象而无科学”才成为“浅化之民”的。要“羞为浅化之民”,就要“奋起直追”,像“优越于近代他族者”的近代欧洲一样,“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这样才能“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这种“科学法则”可以简单地归结为西方自然科学中的实验方法和形式逻辑,“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22]。陈独秀对科学的这种界定无疑是受到了“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23]。

这位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由衷地赞扬现代科学观念在西方社会的成功运用,并热情地向国人描绘这种成功,宣传科学的力量。他要用“个人主义来抛掉传统的思想和政治基点”^[24],以“摧毁旧秩序为己任”^[25]。在他认定的理想的实现过程中,科学无疑是非常有力的武器,尤其是针对“僵死的、中庸的、不精确的和肤浅的”旧有的“思想模式和生活方式”^[26]。史华兹认为陈独秀“的确崇拜科学征服自然的能动作用,但他更把它看作是一种反对‘迷信’的武器”^[27]。中国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乩坛道院”、“仙方鬼照相”却正是最触目惊心的“生活方式”、最顽固不化的“思想模式”,这与陈独秀大力宣扬的唯物论科学思想显然水火不容,自然也成了陈独秀要下大力气来摧毁的“旧秩序”!

从1918年5月15日起,陈独秀等人撰写了《辟灵学》,用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的道理来反驳这些装神弄鬼的人。他在《有鬼论质疑》中说:“吾人感觉所及之物,今日科学,略可解释。倘云鬼之为物,玄妙非为物质所包,非感觉所及,非科学所解释,何以鬼之形使人见?鬼之声使人闻?鬼若有质,何以不占空间之位置,而自生障碍?”何以今之言鬼者,只见人鬼,不见犬马之鬼耶?……他站在唯物论的立场,对“有鬼论”者接连发问,痛快淋漓。从他发问的角度已可以看出他的科学思想中实证和归纳的火花。他是在用他所理解的科学的思维方式同封建迷信较量,比起十年前办《安徽

俗话报》时只是介绍一些简单科普文章、或者揭露群众生活受压迫的现实来,这已经是一个很伟大的进步。如果说那个时候他是无意识地在“旧俗”中撒下科学的星星点点,那么现在,他就是有意识地、十分清醒地要在“旧俗”中立起“科学”这杆旗,冲破“旧俗”的篱藩了。

陈独秀明白,科学首先要揭示“人生之真像”。而真像如何?“求之故说,恒觉其难通”,只有“征之科学,差谓其近是”。那么科学家的解释又是什么呢?“个人之于世界,犹细胞之于人身。”于是“物质遗之子孙”就像“精神传之历史”,虽然“个体之生命无连续”,但“全体之生命无断灭”!所以现实之生命“非常非暂,亦非幻非空”^[28]。可见,陈独秀认为物质是运动的、规律是永恒的,甚至物质的规律也可以移用于精神。基于此,他曾说:“诸星之相毁、相成、相维、相距,皆有一定之因果法则。……地球之成立、发达,其次第井然,悉可以科学法则说明之。……一切动物,由最下级单细胞之动物,以至最高级有脑神经之人类,其间进化之迹,历历可考。……此森罗万象中,果有神灵为之主宰,则成毁任意,何故迟之日久,一无逃于科学的法则耶?”^[29]

这就是陈独秀的物质一元论,也可以说是科学一元论。虽然他对自然科学知之不甚,但今天被学者们争论不休的科学主义似乎在这里已经可以看到端倪。

三 走向唯物史观

“新文化”运动是一场文化启蒙运动,目的是要用民主取代专制、科学扫除愚昧,科学在陈独秀手中是破旧立新的武器,“一种瓦解传统社会的腐蚀剂”^[30]!从一开始,陈独秀宣传和推崇的就是科学的方法、科学的精神和科学的态度,并对这种从价值层面上来接受的“赛先生”寄予了很大期望。可是一战的结果打破了他的这种期望,尤其是对资本主义“民主”的彻底失望,于是对“舟车之两轮”中的另一轮——科学——的价值层面的理解也开始发生变化,他站到了马克思主义旗下。这个时候,陈独秀源自朴素唯物论的科学思想就“升华”为一种唯物史观,他认为,是社会的经济基础决定了一切,能够“变动社会、解释历史、支配人生观”的“客观的物质原因”^[31]也极端化为“经济的原因”。

陈独秀曾对科学做过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指自然科学,广义的包括有社会科学。社会科学就是“拿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用在一切社会人事的学问上。”他认为“凡用自然科学方法来研究、说明的都算是科学。”这样“才是科学的最大效用。”^[32]他用“方法”为科学作上了统一的脚注,而这个“方法”又表现为唯物史观的思维方式,科学一元论在这里又表现为经济一元论。

1921年,在给皆平的信中,陈独秀批评“西洋自苏格拉底以至杜威、罗素,印度自邬婆尼沙陀六师以至达哥尔,中国自老聃、孔丘以至康有为、章炳麟,都是胡说乱讲”,他们根本“不知道用科学的方法研究人物质底分析”,“谣言造了几千年,梦话说了几千年,他们告诉我们的宇宙人生底知识,比起近百余年的科学家来真是九牛之一毛。”这个说法未免过于极端,他轻率地否定了特定历史和社会现实条件下这些思

想家的哲学思想,事实上并不是任何学问都可以“一样一样地分析出不可动摇的事实来”的。但陈独秀偏偏认为“这就是科学,也可以说是哲学。”凡是“离开人物质底分析”^[33],就是“玄杳”,就是“迷梦”!在他看来,只有用了他的科学方法才不是“造谣”,才不是“说梦话”。“盖宇宙间之法则有二:一曰自然法,一曰人为法。自然法者,普遍的,永久的,必然的也,科学属之。”人类将来之进化,应随今日方始萌芽之科学,日渐发达,改正一切人为法则,使与自然法则有同等之效力。”^[34]到此,陈独秀的科学思想已经完美地统一于他的“科学方法”。

不守科学方法便是诗人的想象或愚人的妄想!反之,“守法”便是科学。方法的普遍性使得陈独秀对科学的思考从最先接触的自然科学领域扩充到社会科学领域,他思想中那些早已有之的对于科学的假定和描述此时此刻便“逻辑地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融为一体”。他更加坚信科学一元论,并且认为“当这种科学方法运用于人类社会时,经济学便被看作是最重要的力量。”^[35]这样,他的社会活动便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凡事就有了一个遵从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归纳和实验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历史唯物主义成了他最基本的思想模式。

在对传统的态度上,可以看到陈独秀这种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体现。陈独秀把科学民主同纲常教义放到了对立的位置,“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神州大气,腐秽蚀人”^[36]。其实,这群新文化人反对的不是简单的儒学,而是儒学所要求的那些绝对的伦理要求,基于此,郭颖颐认为陈独秀是在感情上把儒学和宗教等同了。这些金科玉律看似冠冕堂皇头头是道,却恰恰是东方落后于西方的症结所在!陈独秀对此深恶痛绝,他坚持“伦理是被社会所制约的”,不能因为创立者带上了“圣人”的帽子就可以“无视社会变化”,没有这样的“超越的教义实体”!^[37]“孔子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都必须“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38]。现在封建王朝已经寿终正寝,这一套伦理体系早已经不合时代潮流,它们严重压抑了人的个性自由发展、是中国社会进步的主要障碍!因而陈独秀万分热情地推崇科学,把科学作为完全彻底地推翻传统的口号和工具。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 analysis,他觉得最应该取代这些三纲五常的便是现代“科学”,认为这才是符合历史潮流的,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这个时候,陈独秀理解的科学已经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代名词,其触角也大大延伸到了“科学”以外。

四 结语

从学术上来说,陈独秀并不是纯粹的科学家,没有成体系的哲学思想著作。他更多的是一位积极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一位宣传家,擅长并热衷于把科学作为一种方法来加以崇尚和宣传。从他对科学的思考来看,他将科学划分为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分别代表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最终将二者统一于方法。从思想本身来看,他的科学思想从一开始就有明显的实证主义的特点,到后来更是具有了历史唯物

主义的浓厚色彩。陈独秀为中国请来了赛先生,希望借它的力量来赶走孔夫子,让中国也成为法兰西那样先进文明的现代国家。但孔夫子走得并不干净,中国的现代化也完全不是理想中的那么美好,传统没有得到彻底的更新。

新文化运动摧毁了端坐在庙里的泥菩萨,却又在人心竖起一个“赛菩萨”。正如陈独秀自己所说,谁“要有气力有胆量来反对德、赛两先生,才算是好汉。”^[39]可是谁敢反对菩萨呢?“科学”已经成了远远超出其自身范围的方法学,几乎涵盖万事万物,无所不能,成为百姓心中新的权威和信仰。科学的理性精神和民主的自由精神本来都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和倡导的,但随着以陈独秀和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在科玄论战中的胜利,科学的“理性”得到了坚持,付出的代价却是对“自由”的抑制。“尽管他(指陈独秀)的确缺乏对科学的深刻理解,我们还是能非常清楚地看到他的唯科学主义血缘。”^[40]郭颖颐说,这是一个“教条的终结”^[41]。

但应该看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真正价值,在于它在那个充满了愚昧和迷信的混沌的年代发出了振聋发聩的理性启蒙的声音。以陈独秀为首的新文化人以前所未有的激情和愤慨向传统发起挑战,但作为一个历史人物,陈独秀无法避免时代的局限、难以克服自身的偏失。尽管他对科学的理解有所片面、他的行为有所偏激,他对科学的社会价值功能与其知识功能的脱节、以及对前者的过分拔高反倒使得借助赛先生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努力与最初的期望越走越远。但新文化运动极大地促进了刚刚摆脱封建专制的旧中国走向现代文明,客观上推进了中国科学事业的现代化进程却是不争的事实。

现代科学、进步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它们与中国本土文化的融合使得“赛先生”在陈独秀这里呈现出不同于其诞生西方“天然途经”的一种“变异”。这种“变异”为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困惑,给“中华民族的历史上留下了一阵空前壮阔的躁动”,^[1]给后世留下无尽的思考和争论。郭颖颐说“终结”了,恐怕思考还会延续下去。

【参 考 文 献】

- [1][3][4][6][8][24][25][26][37][39][42]郭颖颐.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66、4、48、52、66、50、51、52、59、63、131.
[2]严复.论世变之亟[M].严复诗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

- 出版社,1959.5.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3.
[5][14]林毓生等.五四:多元的反思[M].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9.201、202.
[7][21]邓文金.五四时期陈独秀科学思想论述[J].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
[9]任建树.陈独秀传(上)[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59.
[10][11]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M].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55、88.
[12]“独秀文存”再版前言.1933.陈独秀传(上).59.
[13]任卓宣.陈独秀先生的生平与我的评论.传记文学.第30卷5号.转引自《陈独秀传(上)》,97.
[15]汪孟邹.科学与人生观.胡适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2.
[16][23]张洪波.陈独秀科学思想评析[J].江淮论坛.2002(2).
[17][22]陈独秀.敬告青年[J].新青年一卷一号.
[18][20]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J].新青年一卷一号.
[19]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六卷一号.
[27][30]史华兹.中国共产党与毛的兴起.英文本,9-10.转引自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52.
[28]陈独秀.今日之教育方针[J].新青年一卷二号.
[29]陈独秀.科学与神圣[J].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551.
[31]汪孟邹.科学与人生观.陈独秀序.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11.
[32]陈独秀.新文化运动是什么?[J].新青年七卷五号.
[33]陈独秀.答皆平(广东——科学思想)[J].新青年九卷二号.
[34]陈独秀.再论孔教问题[J].新青年二卷五号.
[35]汪孟邹.答适之[J].科学与人生观.上海亚东图书馆,1923,36-37.
[36]陈独秀.答吴又陵.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646.
[38]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J].新青年二卷四号.
[40]陈延湘,李慧宇.中国新文化思想史纲[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106.
[41]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J].新青年六卷一号.

(责任编辑 成素梅)